

“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民主潮流中,清朝政权存在的合理性已经荡然无存了。

以“中华”为族称:辛亥革命前后的民族认同

李帆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何谓“民族”(nation)^①,如何定义,一向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东西方学术界曾对之作过大量研究,提出种种解释,但众说纷纭,迄无定论,以致一个以研究民族主义著称的西方学者说:“我们根本无法为民族下一个‘科学的’定义;然而,从以前到现在,这个现象却一直持续存在着。”^②

在中国,关于民族的定义有一通常说法,认为民族是“指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的共同体”。“特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③这样的定义,是基于事实的观察与分析而作出的理论概括,客观色彩浓厚,但相对缺乏主体意识,所以有学者在认可客观标准的前提下,又认为,“主观方面,构成民族的要素则是民族意识(national consciousness)。”^④所谓民族意识,是指一个民族共同的自我意识,是一个民族对自身的存在、地位、利益、价值和传统文化的自觉。它的基本内容是颂扬民族精神、民族特性和民族自豪感,强调民族感情的神圣性和民族文化的同质性。这样一种民族意识显然是主观认同的结果,即民族意识是通过“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来实现的。民族认同意味着社会成员以“民族”互相认同,并以“民族”结成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和民族认同密不可分,民族之产生离不开这种认同。

众所周知,民族与民族认同是历史的产物。就中国而言,战国时期,华夏族已成为稳定的民族共同体,但还不是统一的民族,经过秦汉四个多世纪大一统的陶铸,才发展为统一的民族,并且成为统

一多民族中国的主体民族,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凝聚核心的作用。在华夏族形成、发展的这一过程中,自我认同至关重要。由于华夏文化中心观念出现甚早,所以自我认同主要是文化认同,这是华夏族不同于他族的关键所在,“夷夏之辨”便由此而来。

到了近代,华夏民族遭遇到的“夷”已全然不同于古代的周边族群,这些东来的“西夷”步步进逼,已严重威胁到中国国家的生存。正是在这一严峻的挑战之下,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被普遍激发出来,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最终得以实现。

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⑤按照这一论断,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形成乃至发展、壮大是一个自在的渐进过程,而非自觉过程。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非常短,是近百年来事情。在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的形成过程中,“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至关重要,它是近代民族认同的核心环节,它的出现乃至最终在全社会得以确立,方使得中华民族以自觉面目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从根本上说,“中华民族”概念及其思想观念的出现,是鸦片战争以来不断加剧的民族危机的产物。各国列强对中国一再变本加厉的侵略扩张,加重了中国境内各民族人民的灾难,同时也逐步唤醒了他们的民族意识,这一情形,在中日甲午战争后

① 英文“nation”一词通常译作“民族”,但“民族”一词,在汉语中颇多歧义,往往包含种族、族群等不同层面的涵义,故而目前有学者以“国族”译“nation”。

② 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③ 《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83页。

④ 石元康:《民族与民族自决》,《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53页。

⑤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尤为明显。这种民族意识,在各民族的先进分子中首先得到阐扬,并使得他们在救亡图存的政治活动中采取一致行动。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引发国内一片抗议之声,康有为联合18省举人1300余人上书朝廷,沉痛地指陈了当时严峻的民族危机,要求“破除旧制,更新大政”,进行政治改革。一些满族举人参加了这次上书。此后,康有为又领导进行了一系列维新变法活动,这些活动大都有满人参与其中,如满人寿富等创办了知耻学会,寿富亲撰《知耻学会总章》、《学会诫言》等文件,认为知耻方知自强,借鉴“西学自强之新术”,才可能摆脱亡国的厄运,主张通过积极的改革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在文章中还动情地写道:“我中国神明之裔也,尧舜之遗也,不思与英、德、法、日并驾齐驱于五洲,而坐视黑人、红人为奴,思执鞭而从其后,吾不可复见五大洲豪杰之士矣!”^①言辞痛切,催人泪下,爱国之心,跃然纸上。他的号召,实际道出了中国各民族的心声。众所周知,清朝满族统治者一向标榜“首崇满洲”的原则,有意制造“满汉畛域”,将满族置于汉族及其他各民族之上。这一状况,使得人们难以形成超越具体民族的国家共识,更难以形成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意识。所以,寿富的言论,不啻超越了狭隘的统治民族利益,而向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靠拢。而且满族有识之士强调“我中国神明之裔也”,自视为“尧舜之遗”,这体现出各民族在救亡图存运动中,已摆脱狭隘民族界限,逐渐提升大民族主体意识,开始认同一个“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

尽管严峻的民族危机和救亡图存的努力已使“中华民族”观念浮上水面,但其真正作为一个词汇被提出并得到认可,还是有一个过程的。从现有资料看,清末率先使用“中华民族”一词者,可能为梁启超^②。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开始提出并使用“中华民族”这个词,他说:“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

家观,二曰世界观。”^③不过梁氏虽提出了“中华民族”词汇,但其内涵与我们今天心目中的“中华民族”还是有差异的。从文章整体来看,所谓“中华民族”指的仍是华夏族,即汉种(汉族)^④,如文中言:“中华建国,实始夏后。古代称黄族为华夏、为诸夏,皆纪念禹之功德,而用其名以代表国民也。”^⑤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又数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并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但同时又以事实进行论证,说明先秦时华夏族之外的各个民族,最终大都融入华夏族,从而证明“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⑥这样的看法表明,尽管梁启超仍把“中华民族”作为汉族的代名词,但显然已不把汉族看作是单一民族,而是由多民族“混合而成”。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是用“中华民族”概念谈民族混合,而非用汉族概念谈民族混合,所以即便“中华民族”在这里仍等同于汉族,但却从主体民族融化力和各民族不断融合化入的历史角度,明确昭示了主体民族将继续与其他民族融合的趋势。这就意味着“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最终必将是未来民族共同体的统一名称。至少可以说,在承认“中华民族”代表着历史上长期由各民族混合而成的共同体方面,此时的梁启超已有相当的自觉性。

梁启超之后,著名立宪派人物杨度也使用“中华民族”一词,阐发他的民族观念和对于民族问题的看法。1907年,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言:“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欲知中华民

① 《时务报》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

② 参见黄兴涛:《“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形成的历史考察》,《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24—928页。

③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饮冰室文集》之七,第21页。

④ 按梁启超常以“汉种”、“黄族”、“华族”、“中国种族”等词汇指称汉族,可见当时并未将“种族”和“民族”严格分清,概念有所混淆。

⑤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第1册,《饮冰室文集》之七,第5页。

⑥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新民丛报》第三年第十七号,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五日。

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①这样的认识,实际是对中国特有的文化民族观念的现代阐发,依此,中华民族非种族概念,而是文化概念,“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所谓汉民族,源自“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其民族之名则为“中华”。而且此一“中华”,后来“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发生了巨大变化,并非单一民族。按照杨度的说法,与汉族关系密切、文化接近的满族可以说早已同化到中华民族之中了。所以,他主张实行“满汉平等、同化蒙、回、藏”的“国民统一之策”。从杨度的民族观念与民族认同意识来看,他的视野似乎更为开阔,认同的“中华民族”包含的“民族”范围也比梁启超所言更广一些,甚至有了当今“中华民族”观念含义的雏形^②。当然,由于“中华民族”在他们那里基本指称汉族,所谓融入的民族也是与汉族文化最为接近的民族,故而这样的观念里,还是有着大汉族主义的影子,蒙、回、藏三族就因文化上与汉族有距离,而被杨度视作尚未完全融入“中华民族”中的民族。

梁启超、杨度等人对于“中华民族”的阐发,代表着当时社会在中国民族观念上的一种转变,即以历史连续性、文化包容性看待汉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这样具有包容性的观念,有助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萌发,从而利于团结中国境内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力量,共渡难关。所以,作为具有时代意义的崭新名词,“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民族共同体意识萌生的最初体现与重要标志,尽管此一时期“中华民族”一词的使用并不普遍,而且多数情况下仍指代汉族。

总之,辛亥革命前,梁启超、杨度等思想家已提出并多次使用“中华民族”概念,朝着中华民族整体认同之路迈出了一大步,加之立宪运动中朝野各民族间平等融合的“大民族”意识的增强,为“中华民族”后来成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统一族称作了良好铺垫。

对于“中华民族”,各种政治力量形成共同共识,基本是在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建立时期。这其中革命领袖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而中华民国的建立则在体制上确保了中华民族认同的实现。

孙中山的民族观,起初具有浓重的排满革命特征,他所提出的同盟会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特征。不过他主张的排满革命已完全超越了种族复仇主义的狭隘境界,而把满族统治者和满族人民区别开来,他反复强调“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这样的说法,在策略上把满族统治者极大地孤立起来,有利于争取和团结各族人民共同投入到反清革命的行列,是相当明智的。同时它也为后来“五族共和”思想的提出与实践奠定了基础,甚至为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接受“中华民族”观念,并付诸革命实践创造了前提。

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为辛亥革命前已经萌生的中华民族观念的广泛流传,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为国内各民族的平等融合与整体化趋势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民族问题是中华民国建立后临时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形势的变化,自然使得孙中山抛弃了排满的民族革命任务,集中精神致力于民族平等与融合基础上的民权建设与民生建设。民国初期,孙中山接受“五族共和”思想作为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准则。所谓“五族共和”就是“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幸福”,民族统一、民族平等是它的基本原则。“五族共和”从理论上打破了长期以来唯我独尊的民族关系,少数民族在观念上第一次被置于平等地位,从而令统一多民族共和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不仅如此,“五族共和”思想也十分有助于“中华民族”观念的流行与推广。孙中山就反对泛泛而谈所谓“五族共和”,他要求以汉族为主体,积极团结国内各民族,组成一个大中华民族。他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讲中说:“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③很显然,这里提到的“中华民族”概念,已突破当年梁启超把“中华民族”等同于

① 杨度:《金铁主义说》,王晴波编:《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3—374页。

② 参见黄兴涛:《“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形成的历史考察》,《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第929—930页。

③ 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4页。

汉族的局限,而近于我们今日所言之中华民族。可以说,实现国内各民族的真正平等,创建中华民族新族体,是“五族共和”政策的发展与升华,也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新的奋斗目标。

“五族共和”外,“中华民国”国号的使用本身,就极大地增强了国人对“中华”一词所代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的认同感与自觉归属感。人们开始有意识地用“中华”一词来命名各种事物,政党、团体、报刊、企业等都是如此,如“中华革命党”、“中华职业教育促进社”、“《大中华》杂志”、“中华实业团”、“中华书局”等等,这都说明“中华”概念的逐渐流传与被接受。《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以法律形式将人民平等规定下来,如第一章总纲第二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三条“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第二章第五条“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继续发展有了法律上的保护,至少实现了法律上平等的联合。如此的制度保障,有助于固化思想观念,自然也非常有利于“中华民族”观念的深入人心,广泛接受。

对孙中山而言,从倡导“五族共和”到完全认同中华民族,是有一个过程的,1919年五四运动后,是他谈论“中华民族”最为集中的时期。他说:“建设一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之国家,以贻留我中华民族子孙万年之业,庶几今日乃有可庆祝之价值也。”^①“中华民族者,世界最古之民族,世界最大之民族,亦世界最文明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也。……然而最文明高尚之民族主义者,则以意志为归也。如美利坚之民族,乃合欧洲之各种族而熔冶为一炉者也。……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

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定义……斯为积极之目的也。”^②这样的言论,表明孙中山的民族观已跨越“五族共和”阶段,且已摈弃大汉族主义遗存,确立起各民族真正平等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观。所以如此,五四运动的巨大冲击,是关键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人民合理要求的漠视与蛮横态度,不仅激发起五四爱国运动,而且也刺激了一直对帝国主义抱有某种幻想的孙中山,他意识到帝国主义就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敌人,开始抛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而五四运动中学生与各界民众所显示的巨大力量,则使他看到了全民族的希望所在。这样他的民族思想由早期狭隘的种族革命、局限在国内民族革命而转变为明确反帝、具有整体对外性质的反民族压迫的革命,这也正是其“中华民族”观完善及确立的明显标志与最大特色。

与孙中山中华民族观的演进同步,五四运动时期,中华民族一体化观念在社会各界也处于广泛传播阶段。各种政治、社会力量,各行各业的人,乃至少数民族中的中坚力量,都将“中华民族”概念贯穿于言论和行动中,表明大家一致认同“中华民族”是生活在中国领土上所有民族的统一族称。整个民国年间,中华民族认同从未动摇过,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严峻的局势不仅未动摇这种认同,反而促使其更为巩固。

总之,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华民族认同得以实现,这既有赖于革命领袖孙中山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又有赖于民国建立所形成的制度保障。随着历史的推移,这样的认同越发稳固,形成全民族的共识。

革命阵营内的名位之争与辛亥革命的失败

张 皓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三次历史性巨变,那就是结束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使中国人民站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和使中国

人民富起来的改革开放。这三次巨变反映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华民族从苦难深重走向再创辉煌的历史进程。如果要用一个词语来

① 孙中山:《八年今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32页。

②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85—188页。

江苏都督、浙江都督之职而到南京任职。

两集团极为不满。程德全致函黎元洪称“共和结果如是如是,可为浩叹”。并挑拨说:“足下死守武昌,支撑残局,勋名赫赫,尽人皆知,乃第一次之大总统,竟为十七票之孙文攫之而去,天下不平之事,又宁有过于此者。”^①湖北集团宣称“鄂中将士,皆起义有功,而南京均漠置之”,孙武甚至声称“南京如此败坏,吾宁承认袁世凯,而不承认南京”^②。黎元洪以副总统身份兼任大元帅坐镇武汉,俨然又一个中央政府,“湖北军民不满意于孙文,有拟在武

昌组织政府,举黎元洪为总统之说”^③。孙中山、黄兴派柏文蔚进军皖南,做好进击湖北的准备。黎通电指责:“孙公提倡民权,阐明佛学,断不至以权利二字变易!针证诸现象,虽最爱孙公如元洪者,又将难为之解。”^④同盟会与湖北集团之争达到激化程度!

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国歌中有句“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集中概括了革命党人努力效法欧美建立一个近代民主国家的愿望,但在上述名位之争下不可能实现。

(责任编辑 蒋重跃 责任校对 侯珂 胡敏中)

Rethinking the 1911 Revolution

WANG Kai-xi, LI Fan, ZHANG Hao

(School of History, BNU,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Exactly one hundred years has passed since the 1911 Democratic Revolution led by SUN Yat-sen, a tremendous change has taken place, and the relevant studies have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What can we further present to readers about modern Chinese history now? Yet one hundred years' academic studies cannot exhaust all aspects of the Revolution. Actually, more questions at varied levels have appeared along the researches, which demand attention and consideration. The group of papers that follow are what have been newly achieved which based on previous attempts. Professor WANG Kai-x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existence rationality of the Qing Dynasty to discuss how the Qing Government went to its fall in practical political operations and public criticisms. Professor LI Fan offers a systematic account of the form and process of the identity of "Chinese" nationality, which reveals the interactive and mutual influences of the no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Professor ZHANG Hao, which investigates in particular the struggling for fame and position within the revolutionary camp, aims from this perspective to give a reasonable and forceful explanation of the failure of the Revolution. Each of these papers has its particular angle and depth in observation, and they are published here to invite further thinking.

Key words: the 1911 Revolution; the existence rationality of national power; identity of Chinese nationality; the failure of the 1911 Revolution

① 《程德全致黎元洪书》，天津《大公报》1912年1月15日。

②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下，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534、610页。

③ 《要闻》，天津《大公报》1912年1月16日。

④ 《紧要公电》，天津《申报》1912年4月9日。